

由「黨的路線」分析中共對外關係之演變

本所
講師 趙春山

壹、前言

研討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從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中，所依據的理論與實際對外行動加以觀察。

有關中共對外政策的研究，常常是令人困惑的，理由是你認為共產黨人所作的就是所說的那一套，那麼你會困惑於那麼容易就陷入共產黨人玩弄名詞的圈套。目前有關決定中共外交政策的「動機」的研究，姑不論其研究方法是否正確，有下列幾種值得提出來作為參考：

第一，站在一種「歷史學」的假定來分析中共的對外政策。主張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共就如同過去中國歷史上的漢、清等王朝，帶有一種「家天下」的觀念，與周圍的鄰國是屬於藩屬間的關係，因此，中共對於「強權」的看法乃是基於中國的歷史傳統，其對東南亞地區的擴張政策即出於一種「文化的自我想像」(Cultural self-image)，這種政策是屬於理性而有節制的。持這種看法的代表性學者是愛及拉特 C. P. Fitzgerald，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摩堅紹 Hans J. Morgenthau 等。

第二，這一派學者認為中共對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的動機是以共產主義理論為基礎，中共認為他們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為了達到世界革命的目的，中共改造甚至於摒棄了中國的固有文化，農民暴動成了被謳歌的典型。因此，主張這種看法的如麥柯 Franz H. Michael，泰勒 George E. Taylor，饒大衛 David Rowe 等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副產品，而非來自孔夫子」。

第三，另一派學者認為單純的上述任一說法未免以偏概全，應該從中共的「國家利益」和共產主義理論加以並行考慮才算是客觀的，主張這種「中間道路」的學者亦見仁見智各具說法，史卡拉皮諾 Robert A. Scalapino 認為中共主要關心所在乃是強化其內部政權的「存在性」，以便未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居一要角。辛頓 Harold C. Hinton 則認為共產主義理論或許是中共制定外交政策的考慮因素，但決非是一個獨佔性的因素。巴奈特 A Doak Barnett 認為目前，中共已經在積極從事於追求其世界性的戰略目標了，甚至於必要時犧牲西方世界所謂的中共「國家利益」亦在所不惜。^①

第四，日本研究中共問題專家桑原壽二在一篇文章中亦提供了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共對外行動有三個原則，一言以蔽之，

① 參考 Chang, Teh-Kuang, *Communist China's Foreign Policy: Concept and Formulatio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66,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 Ann Arbor Michigan, pp. 67-75.

就是對一切既成勢力的否定，對現有秩序的破壞。所以它是以必然能够打破既成勢力與現有秩序的論據與信念為前提的。^②事實上，西方學者在從事於中共對外關係的研究時，大都偏重於其對外事務的「表象」而忽略了政策本身內涵的「實質」。舉例而言，自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接着萬隆會議之後，周恩來即成為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西方學者心目中最感到興趣的對象，有些人肯定周某是北平對外決策的執定者，誠然，周恩來在制定中共外交策略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我們不妨翻開中共建黨後的權力鬭爭史，周恩來很易於被發現是個從不堅持己見，向來站在多數一邊的角色，永遠是以調停人的姿態出現，可以說是個沒有個人原則的投機政客。不可否認的此乃周恩來在今日中共紅色舞臺上始終位居「不倒翁」的原因之一，但如果由於其人之長袖善舞而一口咬定他就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決定者，而以其言行作為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準繩，則對於中共政權的本質即缺乏深刻地了解。

在研究中共對外活動的過程中，我們很難對於政策作明確性的劃分，存在的困難是「政策」本身在中共領導人的字彙中常常被當作「手段」來解釋。因此，本文的重點將是，以另一個角度來評估中共的對外政策，以中國共產黨作為解剖的對象，誠然，今天的中共已不啻為毛澤東豢養的黨，但如果我們從黨的路線作為探討其對外關係的階梯，則中共外交策略的演變將會如影隨形地展現其蘊涵的精髓。

貳、中共對外路線的策訂者——黨中央

對於專制獨裁的共黨政權而言，黨是對外政策的制定者，而「政府」本身只執行黨決策的工具。「黨的建設」曾被中共自詡為奪取政權的三大法寶之一，早在中共政權成立之前，一九四五年六月中共「七大」黨章的總綱內即有如下的敘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份——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③。而「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大會」，「但在兩次全國大會之間，則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屬於全國大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因此，「黨中央就是全黨的指揮機關，要有中央，才能給全國革命運動規定總的方針，使全黨的工作，在一個總的方針下，合一步步的前進」^④。

因此，無論是在執行或制定對外政策方面，中共負責對外事務的各個機構都必須接受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指導。為了執行此一

② 桑原壽二著「中共何以對外態度強硬」，世界週報，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引自敵情研究外文資料譯叢，國防部情報局編印，第三卷，第十期，民國五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頁二十。

③ 一九五〇年人民年鑑，香港大公書局刊行，一九五〇年一月，頁乙三。

④ 中共「黨的建設」，頁二十二。

黨之領導方針，中共的外交機構中皆設有「黨委員會」或是「黨支部」的組織，「黨支部」的成員由該機構的領導幹部擔任，在「黨委員會」的任命下貫徹中央的指示，「委員會」是該機構黨的分支，「委員會」與該機構的關係乃是基於「機構主管受『黨委會』領導並對其負責」的原則下產生，因此，所有重要的決策都必須經過「黨委會」的同意，並且將實行的成果報告「黨委會」轉呈上級。這些負責對外事務的機構，除了要對內部之「黨委會」負責之外，同時也受到與「中央委員會」有關的其他部門的監督，無論是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都要向這些黨系組織備案。^⑤

黨之「中央委員會」選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實際上是掌握對外事務最後決定權的機構，任何對外政策在交由有關機構執行之前，都是由「政治局」決定的，而一般的例行外交事務則必須經過黨的「中央書記處」加以審核，因此，有關外交政策的決定一般而言是經過下列幾種程序，加以執行：

1 在「中央委員會」「外事政治部」協調下，由黨內有關部門提出的草案，經過「中央書記處」的審核，送至「政治局」批准後交由有關機構執行之。

2 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協調下，由「政府」各有關「部會」提出的草案，提交「國務院」轉送黨「中央書記處」審核，再經過「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審核後交由有關機構執行之。

3 在「中央委員會」，「外事政治部」協調下，由黨內有關部門所作的決策直接交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和「外交部」執行之。

4 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及「外交部」協調下，由「政府」各有關「部會」作的決策，提交黨「中央委員會」「外事政治部」批准，然後交回有關之「部會」執行之。

總而言之，中共負責對外事務機構有關的人事、組織、工作計劃等皆受到黨「中央委員會」和各級「黨委會」的控制。^⑥（參考附表一）

叁、「一邊倒」外交——閉塞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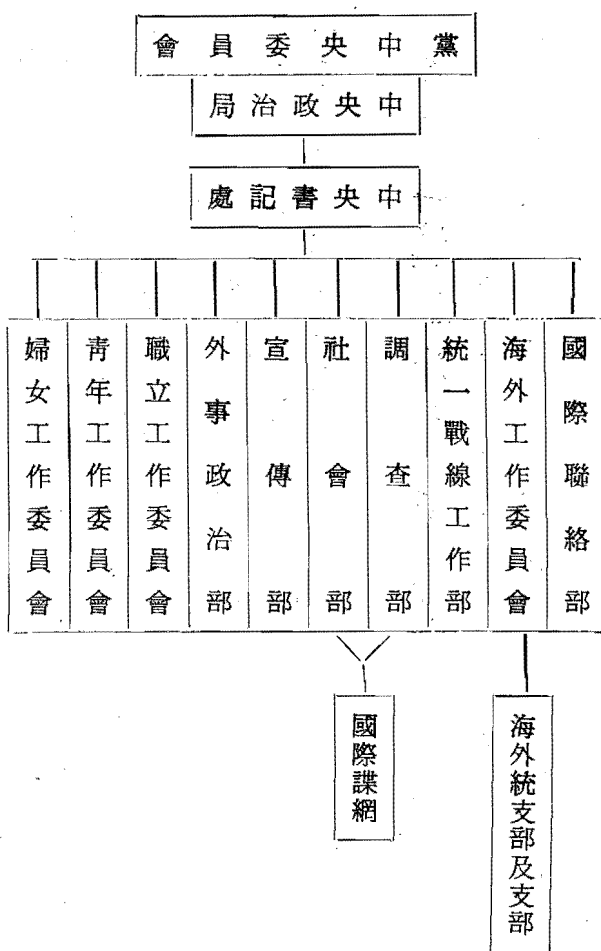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其「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即曾大言不慚地說：「……共產黨的廿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

^⑤ Chen Sheng-wen, *Peiping's Foreign Operation and Their Latest Line of Action*, Issues & Studies, Vol. I, No. 1, October 1964, p. 9.
^⑥ *Ibid.*, pp. 9-10.

三條道路是沒有的」。^⑦

東亞季刊

中共黨系對外工作機構



(附表一)

毛澤東的話是有其客觀背景的，早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中共在其全面從事叛亂的時期，召開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其新訂之黨章總綱中，規定了中共黨員當時階段的對外任務是：「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為解除外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族的侵略，為肅清本國封建主義對於『中國』人民大眾的壓迫，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各革命階級聯盟與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為實現世界的和平與進步而奮鬥」^⑧。此一冠冕堂皇的文字，不久即成爲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有關「外交政策」的基礎，其中有關係的條款是中共初期對外政策的一般性原則，較爲重要的是：

⑦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九六九年，北平人民出版社，頁一三六二。
 ⑧ 一九五〇年人民年鑑，香港大公書局印行，一九五〇年一月，頁乙二。

第五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至於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等條款的規定，無非是一些「條約」、「外交承認」、「保僑」、「貿易通商」等例行「外交事務」。^⑨

上述這些原則，且納入了一九五四年中共的「憲法」之中，成為明文的规定。

我們觀察早期的中共對外關係，明顯的事實是中共政權初立不久，內部情勢不穩，無暇外顧，毛澤東在「人民政協」的開幕詞中即說明：「我們的革命工作還沒有完結，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運動還在向前發展，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因此，「在國際上，我們必須和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團結在一起，首先是和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團結在一起，使我們的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復辟陰謀的鬭爭，不致處於孤立地位」^⑩。毛澤東並沒有過甚其詞，中共當時的「外交」事實是處於孤立地位，當時承認中共而互有「外交關係」的僅止於蘇聯、捷克等少數共黨國家，截至一九五四年十月為止，與中共正式「建交」並已互派使節的國家不過增至二十國，其中大部分且屬蘇聯及其附庸國家。^⑪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這給予中共第一次插足國際事務的機會，同時也讓世人認清其「侵略者」面目的時候。我們不願意對中共的參戰是否經過蘇聯的授意加以肯定，但「從莫斯科和北平在一九五〇年的行為，却指出是莫斯科主動計劃韓戰的」，^⑫而北平當時的對外政策，毫無疑問是尾隨莫斯科的。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雙方成立停戰協定，戰火暫告停息，但韓戰後留下的問題，並非能立時無影無蹤，韓國問題此後成為中共與美國談判時討價還價的資本。縱觀此一閉塞時期，中共在對外關係方面，主要是表現着如下兩種特色：

1 一邊倒向蘇聯，藉蘇聯的保護傘，在外交上鞏固自己，伺機而動。

2 積極爭取與國，謀求政權的「合法性」，以突破外交上的孤立。

肆、「和平共處」策略的外交運用——開展時期

一九五四年四月，由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及其他有關國家在日內瓦為討論韓國及中南半島問題而舉行的會議，中共亦派代表參加，在會議休會期間，周恩來應邀訪問了印度和緬甸，與尼赫魯及宇努會談的結果，雙方分別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⑨ 參考一九五〇年人民手冊，上海大公報出版，一九五〇年一月，頁九—十。

⑩ 同上，頁乙二。

⑪ 一九五五年人民手冊，大公報社，一九五五年一月，頁二八八。

⑫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Moscow*, 「北平與莫斯科」，趙先運譯，民國五十七年六月，政工幹校譯行，頁四二八。

及二十九日發表了「聯合聲明」，一致同意以「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作為此會指導雙方關係的基礎。

日內瓦會議於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結束，姑不論會議的結果在產生了以後中南半島烽火遍地，動亂不安的情況下，已作了價值判斷，會議本身無疑地為中共的統戰外交提供了嘗試的場合。周恩來會後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上的「外交報告」中，即說明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英國的關係得到了改進。這種改進，將有助於我『國』和西方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的可能性的增長。在此期間，我『國』和西方國家間的貿易來往和文化交流，也有了新的發展」。^⑭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使中共的外交觸角有了新的目標，周恩來與納塞會晤的結果導致了中共與埃及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共在萬隆會議的最大收穫，不僅是使北平侵略者的顛覆脚步踏進了黑色大陸，並且在會議上得以藉「種族主義」，大力進行反美運動及販賣「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濫調，中共認為這次會議的召開，有幾項重要的「意義」：

1 「召開亞非會議的決定反映了亞、非兩洲人民堅決反對美國侵略集團在這一地區所奉行的政策」。

2 「亞非會議的召開反映了亞非人民對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無限信心」。

3 「亞非會議的召開，反映了亞非人民決心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⑮

中共此一階段的對外策略，我們可以從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召開的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一些文字中得到許多線索。陳毅在「八大」中，以黨員的資格在「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們的外交政策」的報告中，分析當時國際形勢的特點是，「世界上爭取和維護和平的力量不斷地發展擴大，執行侵略和戰爭政策的國際反動勢力處於日益削弱和孤立的地位，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國際局勢肯定地趨向和緩」，因此，中共的對外政策將是：

1 「『中』蘇兩『國』的強大同盟形成了維護遠東和世界和平的堅強保證；繼續鞏固和發展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親密關係」。

2 「繼續堅決支持一切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鬭爭」。

3 「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對外關係中的基本方針」。^⑯

我們可以發現到，陳毅這份報告，也就是當時通過中共「新黨章」有關對外事務方面的主要內容^⑰。在我們比較一九四五年

^⑭ 一九五五年人民手冊，一九五五年一月，大公報社出版，頁三二六。

^⑮ 施旅「論亞非會議的召開」，世界知識，第二期，北平世界知識社，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頁十二—十三。

^⑯ 一九五七年人民手冊，大公報社出版，頁一一五—一一七。

中共「七大」之黨章後，很明顯地，中共之對外關係，已由消極地「一邊倒外交」發展為積極地參與了。

如果我們歸納此一階段中共之對外策略，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1 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策略運用。明顯的例子是，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向「八大」的政治報告中，雖然指控美國「假借『反共』之名，以便壓制本國的人民，盡可能地控制和干涉處於社會主義國家和美國之間的廣大中間地帶」，然而，既使是面對中共的頭號敵人，北平領導者也不忘記使用「又聯合，又鬭爭」的兩手把戲，劉少奇在報告中特別指出：「我們以五項原則為基礎和平共處政策，不排斥任何國家。對於美國，我們也同樣具有同它和平共處的願望」。^⑮

2 加強對「第三世界」的滲透。特別是對於一些標榜中立及不結盟政策的亞非新興國家。劉少奇的報告中特別指出「在亞非地區，愈來愈多的民族獨立國家採取了和平中立政策，拒絕參加美國的侵略軍事集團，有力地限制了美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⑯明顯的例子，是譴責英法對蘇彝士運河爭端的武力干涉，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開幕詞中特別強調「我們堅決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蘇彝士運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動，堅決反對任何侵犯埃及主權和對於埃及實行武裝干涉的企圖」^⑰。中共的企圖是想要利用埃及作為向亞非地區，特別是非洲國家發動外交攻勢的橋樑。中共在爭取亞非國家過程中，提出最有力的口號是「亞非團結」，中共認為過去亞非國家受到殖民主義國家的剝削與奴役，當此廣大地區獨立以後，帝國主義的威脅並未解除。因此，亞非國家基於「共同的命運」必須團結合作互利互依，中共指控帝國主義的幫助是不平等地干涉他國內政，因此，亞非國家應基於彼此之間的平等原則來互助互利。基於此，北平願意以其一再宣稱的「萬隆精神」來幫助亞非國家。^⑱

在中共高喊「亞非團結」的聲浪中，北平積極地在尋找進入亞非廣大地區的跳板，亞非團結組織（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AAPSO），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斷言，如同蘇俄的一些統戰機構，如世界職工同盟（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 WFTU）等一樣，是中共的同路組織，在中共滲透「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方面，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它是中共影響非洲事務的前瞻。^⑲

^⑮ 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七日。參考中共「黨章」之「總綱」部份。

^⑯ 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⑰ 同上。

^⑱ 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⑲ 世界知識，第八期，一九六五年四月，頁四一七。

^⑳ Charles Neuhauser, *Third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1957-1967*, Harvard University, 1968, p. 2.

^㉑ 亞非人民團結組織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在開羅舉行第一屆亞非人民團結會議的產物。有關此一組織的盛衰，由魏起以至於最後無疾而終，可參考拙著「中共非洲政策的理論與實際」，東亞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民國六十年七月一日，頁一四四—一四五。

伍、中俄共的分裂與中共外交的挫敗——盲動時期

中共與蘇聯的分歧，因而導致共黨世界的瓦解，在中共對外關係史上是個重要的轉捩點。這兩個共黨政權的分歧究竟始於何年，按照中共的說法：「蘇共中央公開散佈一種說法，似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是以一九六〇年四月，我們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而引起，具體地說，這是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二十次大會是蘇共領導走向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②

中俄共的衝突，具體而言，乃是一種共黨世界慣有的權力鬭爭，其表現在對外事物方面的是策略的差別，路線的不同，其最終的目的可說是殊途而同歸。在外交理論上的爭執，我們願意舉出「和平共處」原則不同的解釋與應用作為例子，中共在闡述其「和平共處」的看法時，承認對於不同類型的國家，對於同一類型國家的不同情況，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方針，此即：

- 1 把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加以區別。
- 2 把所獲得政治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加以區別。
- 3 把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加以區別。

所有這些，都是集中於一個目標，那就是，以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無產階級為核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統一戰線。^③

中共在分析俄共的「和平共存」理論時指出：

- 1 蘇共領導認為，和平共處是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凌駕一切的最高原則。
- 2 蘇共領導認為，帝國主義現在已經願意接受和平共處，已經不是和平共處的障礙。
- 3 蘇共領導主張同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實行「全面的合作」。
- 4 蘇共領導認為和平共處是：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對外政策的總路線。
- 5 蘇共領導認為和平共處原則正在決定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當前「共產主義的戰略基礎」，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要把爭取和平共處的鬭爭作為自己政策的總原則。
- 6 蘇共領導把和平共處看作是各國人民革命鬭爭取得勝利的前提。
- 7 蘇共領導認為，和平共處是：幫助國際革命工人運動達到其基本的階級目標的最好方法。

^②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北平，一九六五年，頁六三—六四。

^③ 「中國共產黨堅持列寧的和平共存政策」，同上，頁二九三—二九五。

7 蘇共領導認為，和共三原則。

②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北平，一九六五年，頁六三—六四。

③ 「中國共產黨堅持列寧的和平共存政策」，同上，頁二九三—二九五。

總之，「赫魯曉夫把和平共處政策變成了階級投降政策」。②
因此，中共歸納與蘇聯的關係為「三個原則性的分歧」：

1 爲了爭取實現和平共處，要不要同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派進行鬭爭？實現和平共處，能不能消除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和鬭爭。

2 和平共處能不能作爲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

3 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能不能作爲全世界所有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能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③

事實上，中俄共的暗鬭爲時已久，理論上的分歧，不過是見諸白紙，早在一九五五年萬隆亞非會議上，中共代表們口口聲聲以「同屬有色人種」來誘惑參加會議的中小國家，這一點必然令莫斯科感到十分尷尬，接着不久，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的俄共第二十屆大會上「鞭屍」史大林，毛澤東是史某一手培養，對於赫的指桑罵槐，自難甘心接受，因此，一九五七年始，蘇聯即陸續撤退在大陸之專家，減少對北平的援助。

一九五九年，赫魯曉夫在中共與印度的邊界糾紛中表現的令北平大表不滿，過去，蘇聯總是自動偏袒同第三國發生糾紛的共黨夥友，但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塔斯社的廣播中却要求中（共）印雙方停止爭執，似乎在莫斯科的心目中，毛印是站在對等的地位，事隔多年，毛共才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了他們的憤怒：「兄弟黨內部分歧的公開化，早在一九五九年大衛營會談前夕，具體地說，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開始了。在這一天，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顧『中國』方面多次說明真象和勸告，迫不急待的通過自己國家的通訊社，對中印邊境衝突表示『遺憾』，實際上指責『中國』底正確立場。他們還說什麼這是『可悲的』、『愚蠢的』。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遭遇到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挑釁的時候，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但不指責發動武裝挑釁的反動派，反而指責自己底兄弟國家，這在歷史上倒真是第一次」④。

中共與印度的衝突，使北平「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效用化成了戰火下的餘燼。而當我們分析中共與蘇聯有關「和平共處」理論的分歧時，可以發現赫魯曉夫與艾森豪一九五九年的大衛營會談，確實令中共感到不安，北平領導人畏懼蘇聯會與美國「和平共處」，雖然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公報，對於「蘇聯和美國宣佈兩國首腦將

④ 「蘇共領導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同上，頁二九六—二九九。

⑤ 同上，頁三〇〇—三〇六。

⑥ 北平與莫斯科，前引書，頁四五三。

互相進行訪問一事表示歡迎」，並且指出「這對於進一步和緩國際緊張局勢和維護世界和平事業是有益的」²⁷，但事後，由人民日報承認雙方分歧早在大使會談前夕就已公開化的報導看來，「八屆八中全會」的態度，顯然是在玩弄障眼法。

因此，我們概略地歸納中共此一階段的對外關係時，可以分為下列幾點來討論：

1 中共與蘇聯的分歧，已由暗而明，中共在一九六一年一月舉行的「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莫斯科召開的會議的決議，決議中，中共認為「『中』蘇兩國兩黨的團結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但是「帝國主義者妄想分離『中』蘇兩黨兩國團結的陰謀，是永遠不能實現的」。此不無承認中俄共已公開分歧之嫌²⁸。接着在一九六二年九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公報」中要求「堅決而徹底地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主要危險的現代修正主義」並且認為「這是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的主要任務」²⁹。正當莫斯科與柏爾格萊德進行重拾舊歡之際（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訪問，狄托發表親蘇言論），毛共在公報中同時指責「以鐵托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更加卑鄙地背叛共產主義的事業和迎合帝國主義的需要」³⁰。這代表中俄共的裂痕已更加深。

2 毛共此刻正在為了U二型機事件，掀起新的反美潮，在「八屆十中」公報中繼續攻擊「美帝國主義者變本加厲地推行它的以稱霸世界為目的的侵略和戰爭計劃」，這代表中共「反美」政策的堅持。³¹

3 鼓動亞非拉中小國家反對現存政府，輸出毛澤東暴力革命的理論。當中俄共的衝突日益明朗的時候，雙方的爭執重點即是；蘇俄認為可以用像政治與經濟顛覆的那一類「和平的方式」，將社會主義革命帶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區。而中共却說革命必須是暴力的才能成功。中共希望非洲在此爭議中支持其觀點³²。北平的宣傳工具不止一次地表揚阿爾及利亞，說它是非洲大陸革命的「模式」，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中亦強調了，「古巴人民在取得革命勝利之後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阿爾及利亞人民贏得了獨立……」³³。

毛共日益具有侵略性的真正原因在於激烈派份子，想把他們底大躍進，由對內擴大為對外政策。他們相信只有在各方面都強烈緊張的情況下（包括其他國家的關係在內），才能够產生驅迫人民替他們生產一切所需的壓力。因此，他們使排斥有關於內部

²⁷ 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八月廿七日。

²⁸ 人民日報，一九六一年一月廿一日。

²⁹ 香港大公報，一九六二年九月廿九日。³⁰ 同上。

³¹ 同上，並參考工商日報，民國五十一年十月二日。

³² Emmanuel John Hevi, *The Dragon's Embrac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Afric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 54.

³³ 同註³²。

經濟政策或外交政策的一切溫和作法^{③④}。

周恩來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的兩度非洲之行，其有關「今天，不僅在非洲，而且在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③⑤}的談話，確實讓亞非國家一些有識之士感到憂慮。到了一九六五年，林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後，中共戰爭販子的面目始告暴露於世人面前。綜觀至第二次「亞非會議」流產前後，中共在各國滲透顛覆的陰謀，屢遭識破，一些亞非國家如迦納、蒲薩地、達荷美、中非共和國等相繼發生反共政變，並隨之與中共斷絕了外交關係，使中共的對外關係幾至潰不成軍。

中共在這一階段的挫敗，乃是由於北平的侵略野心令世人產生了警戒，使得反共的氣氛日益瀰漫，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公報中即哀鳴：「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對我國人民遭遇過的暫時困難幸災樂禍，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肆攻擊，演出了囂張一時的反華大合唱」^{③⑥}。

陸、「文革」期間的對外關係——孤立時期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開始對「蘇共」展開指名罵姓的批判，認為蘇共「新領導集團」繼承赫魯曉夫的衣鉢，實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他們的路線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維護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在社會主義世界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中共並且指控蘇共「正在聯合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結成一個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國」的「新神聖同盟」」。『全會』認為「近幾年來，我們黨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所進行的全面的公開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③⑦}。除了反俄以外，中共也不放鬆對美國的攻擊，『全會』認為「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共同敵人。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美帝國主義，必須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而「蘇修」「奉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當然不包括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③⑧}。「公報」中同時「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後勝利」^{③⑨}。

③④ 北平與莫斯科，前引書，頁四三〇。

③⑤ 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

③⑥ 同註②。

③⑦ 文匯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

③⑧ 同上。

③⑨ 同上。

由「黨的路線」分析中共對外關係之演變

此次會議有關對外路線的揭示，可以說是追認毛澤東自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中全會」閉幕以來，歷年所提出和執行的各種重要措施，亦可說是對毛澤東上一階段的盲動外交，使之「合法化」。林彪在這次鬭爭中佔了上風。

如果把這次「公報」與「十中全會」的「公報」作一比較，過去假使中共要抨擊蘇聯時，必定指責南斯拉夫的狄托，而莫斯科指責中共時亦以阿爾巴尼亞為替身，雙方皆使用「指桑罵槐」的手法，但觀察此次中共的「公報」，過去的影子已被露骨的責罵所代替。

根據「十一中全會」的鬭爭策略，中共二面利用紅衛兵掀起「義和團」式的排外運動，大搞反美反蘇鬭爭與支援越共叛亂的宣傳活動，甚至攻擊和搗毀許多國家派駐北平的外交代表機構；一面則向全世界傳播毛澤東思想和輸出紅衛兵，煽動各國共黨走「暴力革命」的道路，特別是在東南亞國家及港澳地區製造暴亂活動。^{④⑤}

中共的盲動路線，使得北平在此一階段的對外關係陷於孤立的地位，「駐外人員」的相繼奉召接受「再教育」，使中共的對外機構幾呈停滯的局面，其導致的影響有下列幾點：

- 1 積極的反美反蘇，迫使美蘇共同圍堵中共向外擴張。
- 2 東歐附庸除了阿爾巴尼亞外，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等皆為文抨擊中共推行「文革」與組織「紅衛兵」。
- 3 「文革」的暴行使若干亞非國家與中共疏遠或保持距離。
- 4 若干西方國家，如英國，因中共在香港製造紅衛兵式暴亂，並策動北平紅衛兵焚燬英國代辦處而與中共關係惡化，法國因中共煽動支持法國工潮和學潮而對中共不滿，義大利因不滿中共向該國輸送毛澤東思想，與中共發生外交齟齬。凡此種種，皆使中共的對外關係陷於空前孤立的情況。

在「文革」期間的暴亂稍近「尾聲」的時候，中共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至三十一日召開了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公報」中特別指出「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指控「美帝國主義對越南進行的侵略戰爭」和「蘇修叛徒集團公開出兵占領捷克斯洛伐克」是「互有默契」，「公報」中同時亦揚言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一切正義鬭爭」^{④⑥}。

值得注意的是「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發表後，中共黨內即積極展開學習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特別將該報告重新刊載，我們要研究的是毛澤東在該報告中有關當時中共對外關係，所揭示的若干原則，在一九六八年的這一段時期，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在該報告中，毛澤東指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

④⑤ 一九六八年匪情年報，國防部情報局，民國五十七年六月，頁二四八。
④⑥ 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

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並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④②}。事後「新華社」在一篇廣播中說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在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時候，重新學習這一光輝文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④③}。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前述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正值中共對外關係的「閉塞時期」，則對中共際此「文革」
「外交孤立」的時候，急急謀於「突破孤立」，要重新學習與「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的指示文件，便不會覺得驚奇了。

柒、「九大」後的「三反外交」——突破時期

中共「九大」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正式開鑼，與過去歷次大會不同，在會議一連串漫長的時日裏，有關會議進行內容的報導始終保持着高度的機密性，至會後才見諸文字。我們從「九大」通過中共的「新黨章」中得知；過去一直強調的「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的「三反」政策，已正式加以確定。新黨章在「總綱」中指出要「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④④}。

我們分析林彪在「九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可以發現，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仍舊是迷信武力和窮兵贖武，林彪在報告中指出：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打常規戰爭，也準備打核大戰」，林彪同時引據毛澤東的話說：「關於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除了要繼續輸出「暴力革命」的理論外，從林彪的政治報告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中共「文革」後的外交仍舊是以反美和反蘇為基礎，「報告」中說明「美帝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了」，指責尼克森政府「繼續玩弄反革命的兩手，表面上裝出一副『愛好和平』的樣子，實際上更大規模地擴軍備戰」，同時「蘇修叛徒集團也是紙老虎」，因此，林彪才要求作好準備「同他們大打一番」^{④⑤}。

我們願意提出討論的是在林彪的「報告」中，「和平共處五原則」再度被提出來亮相，可見中共除了要繼續使用槍桿子以外，在策略上希望以和緩的手段突破「文革」時的外交孤立。

④② 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五日。「七屆二中全會」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舉行於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

④③ 新華社廣播，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六日九時播出。

④④ 「中國共產黨章程」，紅旗，一九六九年，第五期，頁三十五。

④⑤ 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同上，頁二十七—三十二。

由「黨的路線」分析中共對外關係之演變

中共「九大」閉幕以後，爲了執行新訂的對外政策，恢復正常外交活動，陸續派出新任及原任的「大使」多達十七人，前往亞非歐洲地區的十七個重點國家，一九七〇年三月開始又派出新任駐北韓、芬蘭、蘇丹、馬利等國「大使」，從中共外交人事的新佈局觀察，派出「使節」國家大體上均爲對中共友好之共產及非共產國家，而以亞非中立國家爲多，可見中共將以亞非地區爲中心，強化其對外活動，這些派出的「外交人員」包括北越——王幼平（新派）、北韓——李雲川（新派）、阿爾巴尼亞——耿飭（新派）、羅馬尼亞——張海峯（新派）、柬埔寨——康矛召（新派）、巴基斯坦——張彤（新派）、尼泊爾——王澤、阿富汗——謝邦治（新派）、敘利亞——秦加林（新派）、葉門——王若杰（返任）、坦桑尼亞——仲曦東（新派）、尚比亞——秦力真（返任）、幾內亞——韓克華（新派）、剛果（布）——王雨田（新派）、茅利塔尼亞——馮于九（新派）、阿爾及利亞——楊琪良（新派）、馬利——孟鉞（新派）、法國——黃鎮（返任）、瑞典——王棟（新派）、芬蘭——史梓銘（新派）、蘇丹——楊守正（新派）、阿聯——柴澤名（新派）^{④⑥}。除此之外，中共對各國駐北平的使領人員改採友好的態度，並且同意與蘇聯在北平舉行邊界談判，與美國重開華沙談判，來誘騙世人耳目。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公報」中重申毛澤東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當作是「進行反帝鬥爭的偉大綱領」，並且認爲「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北美、歐洲、大洋洲，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都在蓬蓬勃勃發展」^{④⑦}。順此一提的是，在此次「廬山會議」中，那個在「文革」中「堅決批判了劉少奇投降降帝、修，反撲滅各國革命運動的修正主義路線，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④⑧}。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被明定爲「接班人」的中共第二號頭目林彪，亦和毛展開了拼殺，並且在一九七一年九月，遭到了劉少奇同樣悲慘的命運，成爲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我們無法十分確認林彪的被整肅，是否牽涉到北平對外路線執定者，有關外交策略輕重「緩急」的爭辯問題，值得玩味的是，林的作風常常被認爲是激進而好戰的，或許，這僅是一種巧合而已，因爲，事實上毛當初勾結林彪發動「文革」，主要的目的是想利用林的「槍桿子」來對付實力不容輕視的劉鄧當權派，殊不料林的勢力藉以提高，終於遭到毛澤東的猜忌，這種潛伏的因素，到了「九屆二中」全會時，遂成爲表面化。

總括「九大」以後，中共的對外路線，我們可以歸納爲下列幾點來討論：

1 對美國採取的是「又聯合、又鬭爭」的兩手策略，我們從「九大」以及「九屆二中全會」的發表的文字中，可以判斷中共

^{④⑥} 一九七〇年匪情年報，上册，頁（貳）三四二—三四三。

^{④⑦} 人民日報，一九七〇年，九月十日。

^{④⑧} 見林彪在「九大」的政治報告。

黨內有關「反美」的基本政策是不會改變的，改變的只是策略應用的不同而已。「九大」以後，中共首先釋放美籍「間諜」華理柱主教，透過中共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言人史諾，毛澤東表示正在「研究讓美國左、中、右三派人士訪問大陸」，更打破了二十一年的僵局，正式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問北平，展開了所謂的「乒乓外交」，與中共的統戰策略採取相對措施的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美國國務院公開宣佈取消經歷廿年之久的對美國公民前往中國大陸的護照限制，尼克森更於四月十四日宣佈了一項事實上是與中共貿易解凍的計劃，向毛共一意示惠，雙方的關係，經過季辛吉的二度秘密訪平，緊接着是尼克森的訪問大陸，以至於「聯絡辦事處」的設立，幾乎到了惑人耳目的地步，中共外交路線的執筆者，難道真的放棄了一貫堅持的反美立場嗎？我們從「中共中央關於尼克松來『北京』訪問的通知」，一份「供幹部討論用」的文件中，可以得到答案，文件發出的日期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日，即中共美國同時宣佈尼克森訪問大陸之後的數天，該文件例舉十點說明，解釋邀請尼氏訪問的目的，並要求中共幹部向「黨內外普遍傳達」，文件的要點說明，邀請尼克森是毛澤東自己決定的，是跟「帝國主義鬭爭的另一種形式，絲毫不影響我們一貫的，現在仍然堅持的反對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立場」，邀請尼克森訪問是「支援亞、非、拉革命人民特別是越南人民反美鬭爭的另一種形式」，同時也是「孤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重要戰略佈署」^④。由此可見，中共目前對美所採的政策，仍是林彪在「九大」報告所說的「堅決支持美國無產階級、青年學生、黑人羣衆反對美國統治集團的正義鬭爭」^⑤的策略，煽動美國投機政客、姑息主義者、反越戰份子和黑人激進派組織一個反對美國現政府的「統一戰線」，對美國之所以暫時採取「和緩」的路線，乃是要挾美自重以抵制蘇聯，進一步，鬆懈美國的反共意志，分化美國與自由世界的關係，依爲中共「世界革命」過程中的有效運用。

2 中共之混進聯合國，使這個戰後人類渴望和平的理想「聖地」，變成北平施展國際「統戰」陰謀的場所，過去，毛澤東曾批評「聯合國在美帝國主義眼裏……是它手掌裏的工具」^⑥，人民日報且在一篇社論中揚言「『中國』人民無求於聯合國」^⑦，而現在中共却要利用聯合國內中小國家，反對美蘇「超級大國」，企圖扮演「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早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在非洲國家「使節」歡迎尚比亞關達總統的宴會上，周恩來即曾揚言，「聯合國必須加以徹底改組和改造，必須打破它推行的強權政治，政治必須實現大小國家一律平等」^⑧。因此，聯合國之引狼入室，顯示出此一國際組織已自行抹殺當初誕生

④ 參考星島日報，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所載該項「通知」。

⑤ 林彪在「九大」的「政治報告」。

⑥ 見毛澤東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引自中共有關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的學習資料，內部參考資料，頁九三。

⑦ 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

⑧ 同註⑥，前引書，頁九四。

時所揭立的宗旨。

3 對於「第二中間地帶」國家「西方國家」，展開外交和貿易的攻勢，以「作生意」為幌子，進行滲透和顛覆，爲了配合此一攻勢，中共首先要爭取「承認」，在北平的誘惑下，加拿大、智利、奧地利等先後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但作爲中共對外政策的研究者，我們願意舉出中共對「承認」的一種看法：「對中共而言，『承認』的意義，並不是與承認國家關係狀態的改變。基於此種原因，世人遂常常發覺到，北平政權對於沒有承認其政權的國家，往往反較承認其政權的國家更爲友善，實際上，有時候的事實似乎是給予承認的結果，反會減損一個國家與中共交往中的地位，因爲到了這時候，該一國家已再沒有那種特別的利益可資贈予了」。「在商業，文化關係，以及對於各國國民簽證各方面，非承認中共的國家並沒有蒙受什麼相對的不利。因爲所有這些事情，中共都是以經驗爲標準，不管其與別的國家關係的外交狀況，而依其對於每件事情利害而決定的」。^⑤

4 「九大」後的中共外交策略，並沒有改變北平支持「暴力革命」的基本政策，在「九大」開會期間，中共曾公佈了三項有關國際局勢分析的文件，這三項文件認爲「亞洲是世界革命的風暴中心之一」，而中共的亞洲政策將是支持反抗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及日本政府的「武裝革命鬪爭」。中共認爲中東是「國際鬪爭焦點之一」，而非洲人民則正在從事「悠長的困難的曲折的鬪爭」，在中東及非洲文件中，「歡呼巴勒斯坦游擊隊反抗以色列，非洲游擊隊反抗南非及羅德西亞白人政府及葡萄牙殖民政權之鬪爭。在亞洲文件中，讚揚緬甸、泰國、印尼及某些國家共黨的鬪爭，每一個國家的鬪爭「都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下進行」，在日本則「必需堅持暴動的革命原則」^⑥。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發現在中共「笑臉攻勢」背後所隱藏的侵略本質。

5 繼續進行與蘇聯在爭奪共產世界領導權的鬪爭，執行「九大」後「三反」路線，反「蘇修」的政策，一九六九年三月，中俄共雙方在珍寶島事件發生後，毛共指責蘇聯爲「新沙皇」，雙方的對立日漸升級，雖然十月後中共和蘇聯在北平開始了「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但衝突本身由於談判的無進展而有增無減，西方觀察家常常以北平與華盛頓關係的解凍，當作是莫斯科在中國大陸邊界大軍壓境及積極擴張海權的一種示威作用，事實上，克里姆林宮對於中共外交策略的突變，確實感到憂慮，這種憂慮只有加深雙方更進一步的分歧。

捌、結 語

中共「九大」以後，在策略運用上，對美國採取的是一種「低姿態」，這在中共對外關係史上空前未有的突變，確實使美俄毛的三角鬪爭關係，顯得複雜而另人無從捉摸，實際的情況是如何呢？本文爲中共對外路線的背景提供了一個參考的方向，「歷

^⑤ Audrey, Doniflorne, 「中共政權的外交政策」，政治季刊，一九六四年，第三期，引自敵情研究外文資料譯叢，民國五十四年二月卅一日，頁六十五。

^⑥ 參考星島日報，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

史是否會重演」？對於研究國際政治及外交政策的人而言，有其特殊的意義，事實上，對於中共對外關係的歷史作準確性的劃分期，是十分困難的，但如果我們從整體的觀點來探討一個問題，我願意重述一個事例，當中共政權初創時期，出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是屬於孤立而閉塞的角色，爲了突破這種孤立與閉塞，中共對外關係採取了「和平共處」的笑臉外交，但這種「笑臉」並沒有堅持太久，北平立刻代之以「槍桿子」採取暴力輸出的盲動路線，「文革」期間，中共的外交執定者應該作了全面的檢討，爲了打破對外關係的「再孤立」，中共再度擺出了「笑臉」，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北平過去對外活動的前科，這種藏刀的「笑臉」又能堅持多久？

尼克森所謂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概念施用於共產世界可以解釋爲作繭自縛，對於毛共而言，談判同樣是一種「針鋒相對」的鬭爭。展望今天的世局，我們從中共黨的路線看一看其對外關係的演變，可以作爲研究中共今後外交動向的參考。

張棟材先生著

「野坂參三與毛共」

本書為國內研究日共首腦野坂參三與毛共關係之權威著作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定價 新臺幣 四十元
郵政劃撥帳戶 三四三六號